

欧洲哲学史

(试用讲义)

下



武汉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编

一九七七年三月

昂后，傅立叶又一度被革命军逮捕，差点送掉了性命，侥幸得一机会逃回了贝藏松。这段经历对傅立叶的思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他也和圣西门一样始终憎恨暴力行动，反对暴力革命。傅立叶回故乡后，一度又参加过军队，不久因健康状况不佳而退役，为生活所迫，又只得回到他称之为“谎言制造厂”的商业界谋生。后来他一生几乎全在各种商业企业中度过，做过会计员、出纳员、发行员、交易所经纪人等等，先后在里昂、贝藏松、巴黎、马赛等城市从事商业活动，后来较长时期则在里昂定居。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商业界的种种黑幕，有非常深切的了解，为他机智有力地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后半生的漫长岁月中，傅立叶经常过着双重的生活：白天他是一个平凡而勤奋的商业工作人员，夜晚和业余时间则进行着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的紧张的创作活动。1803年，他最初在里昂报纸上发表了《全世界和谐》的论文，其中已包含了他的社会学说的基本原理的雏型。此后，他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其中主要的有《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情欲的力学》（1812）、《论家务和农业的协作社》也叫《宇宙统一论》（1822），以及作为其思想成就最高峰的著作《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28—1829年他回家乡写最后这部著作，1829年又到巴黎出版该书，此后就在巴黎度其余生，直到1837年去世。晚年，在他周围也聚集了一批朋友和学生，形成一个傅立叶的学派，他们人数不多，对他也并不真正了解，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反动的小宗派。而傅立叶自己，一面继续从事着著述活动，一面就沉浸在自己的空想之中，甚至

命“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5页）即在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爆发之前，早已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为这次革命大造舆论了。这一章所论述的主要内容，就是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当时各个革命阶级和阶层为这次大革命作舆论准备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由于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彻底的一次，为这次革命作舆论准备的唯物主义哲学，也达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哲学的高峰，成为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种形态即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最典型的表现。

这种哲学和文化思想上的繁荣发展，首先是经济高涨的结果。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十七世纪前，是远较荷兰、英国等先进国家为落后的。十七世纪后半期在路易十四统治时代，为了发扬“国威”，开辟财源，也采取了奖励工商业的政策。当时称霸欧洲大陆、处于君主专制极盛时期的法国王室，一度成为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表面上的“中间人”的角色，采取了一些保护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措施。这样，也就加速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十八世纪，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资本主义在农业和工业中更有了显著发展。东北部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化的农场，有些地主也和英国的一样资产阶级化了，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经营农业，并促进了农村阶级的分化，富农阶层也增加了。矿业和工场手工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有了较大规模的煤矿、炼铁厂和铸造厂，毛、麻、丝的纺织工业以及皮革企业也都有了相当规模。商业的发展甚至比工业更快。虽然这一时期法国资本主义比它本身在十七世纪前的情况，乃至比英国和荷兰在革命前的情况，都有了较程度的发展，但比起当时已开始进

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和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荷兰来，还是比较落后的，而法国在十八世纪却产生了较这些国家更先进的哲学。这是因为，如恩格斯所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485—486页）所以，除了经济的高涨，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一根本条件之外，我们还必须更进一步弄清由此引起的政治形势，即阶级斗争的状况，以及当时可供利用的“**特定的思想资料**”，即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和作为思想渊源的哲学遗产对法国哲学的影响，才能说明十八世纪的法国何以能够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一般说来，正是当时法国阶级矛盾的特别尖锐，促使产生了革命性较强烈、较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并把所继承的唯物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革命前的法国，社会上存在着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高级僧侣，第二等级是贵族，其余的居民统称为第三等级。头两个等级虽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但是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并享受着种种封建特权，残酷地

剥削人民而过着骄奢淫逸、荒淫无耻的生活。他们除了以封建地租、劳役剥削压迫人民之外，还依靠国家政权，以种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向人民进行巧取豪夺。高级僧侣所把持的天主教会，本身就是最大的封建主，占有大量最好的土地。教会除了直接利用所占土地剥削农民外，还向农民征收“什一税”，和强加各种封建义务。高级僧侣生活的豪奢和腐化比世俗贵族有过之而无不及。教会更以宗教教义多方支持完全腐化、过时了的封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天主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是整个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这两个等级不仅残酷压榨广大劳动人民，同时为了自身的利益竭力维护反动没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当时法国社会上的反动力量和革命的对象。法国的专制王室虽如上所说曾一度充当过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表面的“中间人”角色，但它本身毕竟是封建制度的产物，正是封建势力的集中代表，随着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封建王室也日益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和整个社会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最后也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了。

除了以上两个特权等级之外，其余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居民统称为“第三等级”，其中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也包括资产阶级和作为近代无产阶级前身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矿工和城市贫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等各种社会阶级成份。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第三等级都受着高级僧侣和贵族这两个封建特权等级的不同程度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此他们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但他们彼此之间，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之间，又由于阶

级地位的不同，自始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

资产阶级中也还有不同的阶层。少数资产阶级是由贵族转化来的，还有少数大资产阶级则买了贵族爵位，他们比较接近贵族，政治上也享有特权，但由于封建制度阻碍了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因此也还是有反封建的要求，但自然革命性较差，多半只希望进行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良而并不要求根本性的革命。至于一般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则这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上已有了相当强大的力量，而政治上却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和他们的经济地位很不相称。正是这一部分的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处于最尖锐的对立地位。他们极欲推翻封建制度，取消封建特权，解除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束缚，同时取得和自己的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进而建立自己的统治以便更顺利地发展资本主义。由于这时的资产阶级有强烈的反封建革命要求，它的经济力量又较强大，而农民既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这时还很不成熟，甚至尚未形成为统一的阶级，因此资产阶级就成了整个反封建阵营中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虽和第三等级中的其他阶级和阶层也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但这时期这种矛盾尚未激化，而反封建的利益一致的方面还处在主要地位，因此使资产阶级与它们、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得以结成联盟。如列宁所指出：“法国1789年的问题是推翻专制制度和贵族的问题。资产阶级在当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上，相信它的利益同农民的利益协调一致，不耽心自己统治的巩固性，而同农民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保证了革命的彻底胜利。”（《论革命的两条路线》，《列宁全集》21卷385页）和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

级比较起来，十八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相对地已较强大，而政治上更无权、更受压迫，因此革命性较强烈，它不是象英国的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结成联盟而是与农民结成联盟，使革命成了真正的人民革命，这些就是十八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比它以前的革命都较彻底的原因，也是使反映了这次革命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成为与公开的战斗无神论相结合的较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在当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的根本原因。当然，说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性较彻底，只是相对而言，它和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结成联盟，也只是暂时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种两面性，法国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

小资产阶级在法国革命过程中也起过重要作用。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封建特权等级乃至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更甚，因此反抗性也更强烈。他们在经济上要求限制富人的财产，在政治上要求取消一切等级特权，实行民主。大家知道，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正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才实行了对反动封建势力和一切反对革命的分子进行严厉镇压的“恐怖政策”，对封建制度进行了较彻底的摧毁。但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经济地位极不稳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也往往表现出动摇、矛盾。

在第三等级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受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最为惨重。他们除负担封建地租，封建国家的各种苛捐杂税，教会的“什一税”，以及各种封建义务和劳役之外，也还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在开始用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农业的地区，农民往往被夺走耕地，和被剥夺了按惯例享有

的放牧牲畜、打柴等权利，处境甚至更悲惨。许多农民沦为乞丐，绝大多数农民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很多地区饿殍遍野。在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早在1789年的革命以前，就已屡次发生过农民起义。在整个反封建革命阵营中，农民人数最多，事实上也是向封建势力冲击的主力军。但由于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而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作为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参加反封建革命的。而在革命胜利后，他们也只是换了一个统治者，仍旧不能得到本身的解放。

除了农民之外，城市中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矿工和其他城市贫民等，是近代无产阶级的前身。他们受着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处境的困苦比农民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也有极强烈的革命要求。虽然一般说来，作为近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这个阶级在这时期还很不成熟，没有作为统一的阶级和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也是作为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一支力量参加反封建革命的，但由于它的利益和资产阶级自始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在参加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封建革命的同时，也爆发过这一阶级反对一切剥削制度的独立的运动。早在八十年代，巴黎、里昂、卢昂、第戎等城市就都爆发过工人和城市贫民的强烈骚动，特别是在1789年以后的革命过程中所进行的“巴贝夫运动”，更鲜明地是在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不仅反封建也反对刚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先驱的独立运动。虽然由于历史条件不成熟，这种革命不能不陷于失败，但在工人运动史和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都还是有它重要的意义。

总起来看，居于统治地位的高级僧侣和封建贵族，以及集中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封建王室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整个第三等级是革命的动力，其中资产阶级是当时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则是革命的主力军。资产阶级由于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受到封建制度的阻碍，政治上受到封建特权等级的压迫，就利用第三等级中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制度的不满和反抗情绪，积极准备、动员并领导整个第三等级对高级僧侣、贵族和专制君主进行斗争，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当时法国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势。而在第三等级内部各阶级之间，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以及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除了反封建利益一致性方面之外，也自始存在着利益上矛盾的方面。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种原来未激化的矛盾也逐渐激化，这就表现为例如在革命过程中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巴贝夫派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等等。而所有这些阶级间的矛盾斗争和分歧，都在哲学思想领域内有着相应的、鲜明的表现。

作为反动的贵族和高级僧侣这些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的，依旧是传统的天主教教义及其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这些都已思想上的僵尸，毫无值得一提的新鲜内容，但它们是在当时社会上存在着的，并且正是各种先进的、革命的思想所攻击、批判、斗争的主要对象。

在反封建的阵营方面，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劳动人民，这时也有一系列杰出的思想代表，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早在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交，就有梅叶，在十八世纪中

叶，有摩莱里和马布利，而在革命过程中，则有巴贝夫等。他们都提出了反对一切剥削制度、要求消灭私有财产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在共产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思想，特别如梅叶的思想，诚然也直接表现了苦难深重的农民对封建压迫的强烈控诉和反抗，但作为空想共产主义也属于近代无产阶级先驱者那个阶级的思想体系。

作为这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反封建思想的是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首先有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如著名的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孔狄亚克等人，他们也提出了反封建、反教权主义的政治纲领和以自然神论形式表现的唯物主义哲学纲领，起过很大的鼓动作用，但一般表现得较温和，有明显的大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乃至反人民性。其次，有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如卢梭，他的政治观点是比较最激进的，成为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思想旗帜，但在哲学上则还未完全摆脱唯心论的影响，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矛盾、动摇的特点。最后，作为这一时期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的，则是代表资产阶级先进阶层的“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为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他们把十七世纪西欧先进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克服了种种形式的神学不彻底性而与战斗的无神论结合了起来。所有这些思想汇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反封建的思想巨流，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这种思想运动是在上述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产生，同时又给实际斗争以巨大的推动，成为1789年的政治革命的社会变革的先导，它的社会历史意义也远不限于法国境内而有着巨大的、深远的国际影响。由于这一思想运

动及在其影响推动下所进行的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大的世界性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其唯物主义哲学的成就，“使十八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385页）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所以达到较高水平，除受上述阶级斗争形势所决定外，也和当时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新成就有密切联系。而它的局限性，也和当时自然科学的状况分不开。

当时自然科学上的主要成就，还是在数学、天文学等方面，但比十七世纪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法国的科学家作出的贡献也是比较突出的。其中著名的人物如出生在瑞士的数学家欧勒（1707—1783年）和雅各·别尔努伊（1654—1705年）、让·别尔努伊（1667—1748年）兄弟，他们的研究工作使自然科学中数学方法的应用得到了很大发展。法国的拉格朗日（1736—1813年），所著的《分析力学》总结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以来的古典力学，奠定了分析力学的基础。法国的达朗贝（1717—1783年），本人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几何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曾和狄德罗一起编纂过《百科全书》，并为其写了著名的序言。法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1749—1827年）在科学发展史上更占有重要地位，他的研究工作是利用力学规律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意图的典型表现。他和康德各自独立地提出的关于天体演化的“星云假说”，把宇宙看着是一个按力学规律由原始星云经一个发展过程演化成的，则给当时盛行的把宇宙看着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宇宙观打开了一个缺口，在科学和哲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拿破仑曾问拉普拉斯，为什么在他的

《宇宙的体系》中对神只字未提，他回答说：“我的假说不需要神。”这一回答意味着科学战胜了宗教，也表明为唯物主义无神论提供了牢固的自然科学基础，是在历史上很著名，也很有意义的。虽然拉普拉斯出生较那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们要晚些，但总的说来还是属于这个时代，可以说明这个时期科学和哲学的状况的。在物理学方面，积累了更多经过检验的经验材料，丰富了牛顿的古典物理学，也进行了对于热和电等的现象的研究，当时一般认为热是由于物体中含有一种“热素”，燃烧是由于可燃物质中含有“燃素”，而电是一种流体即“电液”，并按其不同来源分为“树脂的电”、“玻璃的电”等等。在化学方面，法国科学家拉瓦锡（1743—1794年）用实验证明了燃烧是由于可燃物与当时未知的元素“氧”化合的过程，从而推翻了“燃素说”，并第一次把真正的化学元素称为元素，为近代化学奠定了基础。在生物学方面，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瑞典科学家林耐（1707—1778年）所制定的植物和动物分类的体系和把物种看作一成不变的观点，但法国科学家毕丰（1707—1788年）则相反地提出了生物界变异的猜测，并指出了猿和人的起源的共同性，他和另一科学家莫柏都依（1698—1759年）的类似观点都对狄德罗等人的哲学观点有显著影响。

这些自然科学的成就，为当时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更丰富的思想资料和更有力的论据。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先进哲学家在论证他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批判宗教神学及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时，是常常引证他们以前和同时的这些科学家们的成就作为依据或例证的。当时的自然科学虽比十七世纪有所进步，但总的说来仍旧还只是处在搜集材料和对

各种自然现象作分门别类的观察、实验，和作初步的数学上的处理的阶段，并且只是对最初步的运动形式即机械运动的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因此仍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占统治地位，这也就决定了当时的唯物主义哲学也难以避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当然，这也并不排除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中的少数杰出人物，仍然在某些问题上有一些可贵的辩证法思想。同时也要看到，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自然辩证法》11页）

除了总结和依靠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之外，当时的启蒙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自古代以来唯物主义哲学和先进社会观点的传统，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早期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和先进社会思想的传统的。古代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等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及进步的社会伦理观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蒙台涅、哥白尼、布鲁诺等人的哲学和科学观点，都对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有巨大影响。尤其是十七世纪英国和荷兰、意大利的培根、霍布斯、洛克、托兰德、斯宾诺莎等人的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观点，以及法国本国的笛卡儿（物理学方面）、伽桑狄的哲学，对他们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中洛克的哲学和笛卡儿在物理学方面的唯物主义观点，更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直接思想渊源。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

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卷160页）此外，洛克对于其他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孔狄亚克以及卢梭等人的哲学和政治观点的影响，也是特别显著的。当然，他们都不是无批判、无选择地继承前人的思想，而是从自己当时的阶级地位和需要出发来吸取和利用前人的观点，并给以不同程度的发展或改造。一般说来，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是继承了十七世纪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英国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传统，克服了十七世纪唯物主义的种种神学的不彻底性，发展成为与公开的战斗无神论相结合的唯物主义，从而把唯物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在继承十七世纪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同时，不仅反对了传统的经院哲学，也反对了十七世纪代表向封建势力妥协投降路线的唯心主义和唯理论的思辨的形而上学，如笛卡儿的“形而上学”方面的唯心主义和莱布尼兹的唯心主义；另一方面，也对和他们约略同时代的英国已爬上统治地位以后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即贝克莱、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由于上述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决定了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具有一些主要的一般特征。总的说来它和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特别是十七世纪西欧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属于同一个范畴，都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封建革命时期的思想，因此也具有共同的一般特征，但它也因时期和民族的不同，而带着自己独有的特点。具体说来，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这一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

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以来的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一样，以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冒充全人类的利益，宣扬普遍的“人性”、“人权”，并从这种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宣扬“普遍的理性”、“永恒的正义”以及抽象的“自由”、“平等”等等。法国大革命时期所提出的著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就是从这些启蒙思想家那里汲取来的，在一定意义下也就是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概括。这些思想，以及社会历史观和政治学说方面所宣扬的“自然法”、“自然权利”、“自然状态”、“社会契约”，乃至“三权分立”等等一套思想，其基本的精神和原则，也是和前此的资产阶级代表们的观点共同的，虽然具体主张上也各有些不同，只是这一时期的思想，作为资产阶级范围内最彻底的一次革命的舆论准备和反映，在反封建、特别是在反教权主义方面，革命性比前此的更坚决，更强烈，也比较彻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接着又指出：“现在

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反杜林论》14—15页）恩格斯的这段话，就是对这一时期法国启蒙思想一般特征的高度概括的精辟论述，和对它的历史地位及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的全面评价。

就哲学观点方面来说，当时一些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世界观一般还停留在“自然神论”的水平，虽然实质上也是一种唯物主义，但毕竟还有神学的不彻底性。而作为资产阶级最先进阶层的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则终于达到了在资产阶级哲学范围内最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水平。他们的唯物主义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与公开的、战斗的无神论密切结合了起来，完全克服了十七世纪唯物主义的神学的不彻底性，这正反映了十八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完全丢开宗教外衣，在公开的政治基地上作战的革命。除了上述的特点之外，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也与十七世纪的唯物主义一样具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和在历史观上仍旧陷于唯心主义。恩格斯和列宁都一再指出过的资产阶级早期的唯物主义的这三种局限性，主要正是针对着法国唯物主义说的，这些局限性也是在这里表现得最鲜明，最典型。其所以会具有这些局限性，既与如上所述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分不开，归根结蒂也是由资

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作为剥削阶级，即使处在最具有革命性阶段的当时法国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具有不断发展的观点和掌握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法国唯物主义总的说来具有这些局限性，但并不排除他们在某些具体观点上还是有些辩证法思想，如狄德罗甚至还有较丰富的辩证法观点，并且也正是某些具有辩证法因素的思想，如肯定物质自己运动，物质与运动不可分的观点，才使他们不需要假设神的第一次推动而达到在自然观上较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水平。此外，在认识论上，他们一般都站在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立场，除反对唯理论外，也反对了唯心的经验论。同时，他们中个别具有较丰富辩证法因素的代表如狄德罗，也表现出某些企图克服经验论的片面性，把经验和理性结合起来的倾向。

总之，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虽然具有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它是整个资产阶级反封建革命时期具有比较最坚决、最强烈的革命性的思想，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第二种形态的最典型表现，并且和十九世纪德国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来源之一，值得我们高度重视。